

## 历史

# 大战略视角下苏俄外交布局与嬗变

刘宇

【内容提要】苏俄初期的外交带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革命外交因缺乏理想的实践环境而推进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动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促使列宁放弃原有的“创业计划”，将革命理论与新的实践经验结合，探索利用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与惯例发展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确立了新的战略框架，务实地调整外交布局。1921年后的苏俄外交，一改最初拒绝一切传统外交形式和惯例的倾向，开始有意识地回归传统，朝着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方向演化。苏俄的国际角色定位、战略性利益、外交战略手段等要素减少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为妥善地处理了革命理想与现实国家利益及外交传统的平衡，这对提高苏俄外交地位，改善生存与发展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苏俄的外交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战略态势逐步改观，整个苏联时期外交的基本轮廓在这一过程中初步成型。

【关键词】大战略 苏俄 外交 传统外交 经贸往来

【中图分类号】K51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6) 06-0025-0011

“战略”一词最早以军事用语出现，东西方均沿用已久。近代以后，频繁的战事推进了战略研究的发展。进入20世纪，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创立“总体战”理论，将战略理论的范围扩展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乃至精神领域。英国军事思想家李德哈特继之发展出“大战略(Grand Strategy)”理论。其后，战略学者保罗·肯尼迪进一步深化大战略研究，消除大战略在战时与平时的分野，强调综合运用力量手段实现战略目标。笔者认为，大战略内涵与外延的不断充实具有双重学术意义：从狭义上讲，它升华了李德哈特的战略理论，标志着军事战略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纵向发展高度；从广义上讲，由于大战略概念中所蕴含的思维框架与范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这种总体思路

得以突破军事研究领域，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战略研究提供范式。1917—1924年的苏俄外交对新生苏维埃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封锁孤立中寻求生存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奠定了苏联外交的基础。学界以往研究多从单一角度展开宏观分析。本文将视角延伸至大战略层面，依据《列宁全集》、苏联外交档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件等国内外史料，结合大战略理论进行系统化考察，力图勾画出一幅苏俄时期<sup>①</sup>外交布局及其嬗变的细密图景，为深入揭示苏俄外交的历

<sup>①</sup> 为便于研究，本文将苏维埃俄国时期和1922—1924年的苏联时期纳入到“苏俄时期”这一统一的时间概念下进行考察，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期在列宁的领导周期内具有政策上的连贯性，从外交上看，这一时期亦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对后世苏联外交影响颇深。

【作者简介】刘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史内涵探索新路<sup>①</sup>。

## 一、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外交布局

对大战略来讲，战略布局处于战略实施的初始阶段。中国古训“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正切中布局与战略关系的肯綮。“先谋于局”强调首要在通盘考虑、全局安排，“后谋于略”指在战略布局基础上思考实现目标的方式，“略从局出”指大战略以战略布局为基础，其成功依赖于全局的安排<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为苏俄提供了无产阶级外交的系列指导原则——道德和正义原则、和平原则、民族独立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sup>③</sup>。1917年11月8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拟定的《和平法令》，声明废除秘密外交，废止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期间签订的秘密条约。法令着重表达了苏维埃政权反对强国对弱小民族领土的强力侵占，倡导民族自决权，主张各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立即缔结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和约。苏俄新政权意在开辟一条革命的外交路线，把反对战争与推翻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进行世界革命紧密结合起来<sup>④</sup>。这就是列宁在革命前酝酿的“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sup>⑤</sup>理念的实践，以打破旧的国际格局，建构新的世界体系。

1917年12月3日、6日，苏俄接连发布《致俄国和东方所有穆斯林劳动者》的呼吁书、《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公布秘密外交文件的声明》，申明废除旧俄政府签订的关于东方国家的秘密条约，号召“东方的穆斯林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sup>⑥</sup>。这进一步加强了苏俄面向弱小民族和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外交行动。

同时，对俄国内部的民族独立运动，苏维埃政权也采取了支持态度。1917年12月，苏俄承认芬兰独立。1918年初，土耳其属亚美尼亚人的民族独立运动得到苏俄支持。短期内，原属俄国版图的民族区域纷纷独立，表现出苏俄对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等外交原则的推行力度，同时为苏维埃政权与这些独立国家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将苏俄对外路线具体表述为：“首先支持先进国家

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革命运动。”<sup>⑦</sup>争取西方国家劳动阶级和民众的支持成为苏俄外交的首要方针。按照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说法，苏俄在1919年很少对政府提照会，而更多是发表告工人群众的呼吁书<sup>⑧</sup>。

苏俄建立后首要的外部威胁来自德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对其后可能面临的战争做出预测，认为协约国不可能与德国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其中的关键在于，一方面是俄国可以通过缔结公正的和约赢得停战，另一方面是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抵消了协约国与德国联合干涉俄国革命的可能<sup>⑨</sup>。苏俄从1917年12月22日开始与德国进行单方面媾和谈判。尽管德国以武力威胁，并向苏俄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但列宁力主与德国签订和约，通过舍弃空间来赢得生存时间。在列宁的推动下，1918年3月3日，苏德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苏俄为此丧失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广大领土，并放弃在东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的利益，损失惨重。但苏俄保住了革命阵地，能够继续等待和支持欧洲无产阶级革命。

一战结束后，正当苏俄的革命外交布局展开之时，协约国对俄国革命的干涉逐步从隐蔽走向公开。1918年3月9日，英国干涉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随后，法国、日本、美国相继从不同方向侵入苏俄。协约国集团支持并联合俄国反革命势力共同打击苏维埃政权。1918年11月至1919年末，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一共从境外获得了80万支步枪、1.3万挺机关枪、1300多门大炮以及坦克和弹药

① 王存刚教授认为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深入解读马克思经典作家论述国际问题的文本上存在不足，且运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调、陈旧。参见王存刚：《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进展与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③ 鲁毅等：《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4页。

④ 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⑤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⑥ [苏]И.А.基里林主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邢书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⑦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71页。

⑧ [苏]尼古拉·茹可夫斯基：《苏联早期外交家的故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页。

⑨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等<sup>①</sup>。战争中，苏维埃政权遭受敌人的内外夹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一度面临陷落危险<sup>②</sup>。生死存亡关头，苏俄政府大力动员人民，开动军事机器，在各条战线上英勇抗击，阻挡住了反革命势力的进攻。

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苏俄政府开始调整策略，尝试在外交方面寻求突破。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再次向英、法、美、意、日等协约国建议，与他们全体或单独开始和平谈判。各国在干涉苏俄革命的问题上，利益动机不同，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矛盾重重。美国陷于欧洲战场，在远东地区所能投入的兵力有限，因而对日本进占西伯利亚的举动时刻戒备，暗中掣肘，并于1919年3月派出使者布利特与苏俄接洽。

在北欧及波罗的海方面，苏俄利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矛盾积极活动。1920年2月2日，苏俄与爱沙尼亚签订和平条约，打开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而后，又与立陶宛、拉脱维亚、芬兰等国订立和约，获得了西北边界的和平。

从十月革命至1920年底，苏维埃政权面向北欧小国的国家间外交取得收获，但为建构社会主义体系的革命外交进展甚微。苏俄建立初期的外交布局亟待调整。

## 二、苏俄外交的嬗变

经历三年多的外交实践，苏俄领导人的诸多理念、观点在1921年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指引苏俄对外交战略做出了重要调整，在战略态势的塑造上进入新的轨道，从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到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秩序，这是新生革命政权适应生存环境，让革命理论落地生根的过程。

### （一）苏俄外交战略指导思想转变

很难明确界定影响苏俄外交战略变化的思想因素，总体上，它包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简称“一国胜利”论）、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租让思想以及新经济政策中涉及对外贸易的思想等。此外，俄国传统对外战略思想亦不容忽视。概而言之，以上这些思想观点集聚为苏俄领导人对推进俄国革命和外交的系统性战略思考，是一项集合概念。

列宁认为，要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大战破坏经济导致世界性危机有引发革命的可能，应抓住契机，

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寻求革命突破。“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就完全有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sup>③</sup>

十月革命的胜利初步证明列宁思想的可行性。此外，1918年欧洲的革命形势使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前景表示乐观。1月28日，芬兰革命政府成立，并与苏俄签订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条约。尽管当时苏俄面临险恶的形势，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世界革命，以此减轻生存压力。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最大的课题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将苏俄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但无论从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抑或是从其国内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来看，帝国主义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sup>④</sup>。

1919年，德国、匈牙利也建立了革命政权，奥地利、荷兰、芬兰、拉脱维亚等国革命纷纷涌现。在苏俄领导人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春天仿佛已经到来，胜利指日可待。共产国际向各国无产阶级党派出宣言，号召“为保障和巩固各国苏维埃革命政府的国际地位而斗争”<sup>⑤</sup>。但欧洲的革命运动遭到各国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残酷打压，欧洲的革命政权未能对苏俄提供有力援助便被扼杀。各国无产阶级力量真正崛起尚需时日。1920年4月，苏波战争爆发后，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燃起苏俄推行“刺刀上的革命”的热情，并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波兰无产阶级身上<sup>⑥</sup>，最高决策层的意图是，拿下波兰，使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使革命之火通过波兰燃向其他欧洲国家<sup>⑦</sup>。最终，由于红军战线过长，供应困难，致使其在华沙城下受挫。这一失利使列宁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 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 С. 31. 转引自沈莉华：《从对抗到承认：1917—1933年的俄美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6页。

② 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成立防御委员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已实行局部疏散。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武装干涉俄国的宣言》，1919年6月18日，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73—74页。

⑥ [俄]安·阿·科科申：《战略领导论》，杨晖总译审，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⑦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一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认识到既定路线存在政治或战略上的错误，并不是简单纠正错误那么简单，苏俄迫切需要解决当前的政策问题<sup>①</sup>。

也就是从这时起，列宁对世界革命的规划和苏俄的前途有了新的考量：第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今后仍将处于苏俄一国独存阶段，苏俄有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可能；第二，苏俄已经跨越解决生存问题的阶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三，苏俄需摒弃欧洲革命很快胜利的幻想，寻求新的途径实现革命目标。苏俄政权在外交不睦的情况下坚持了三年之久并最终与资产阶级集团形成“长期僵持、双方最后不分胜负的局面”提振了列宁的信心，使他敢于放弃依赖欧洲革命援助俄国革命的路线。

和平共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修正了此前帝国主义和苏俄不能同时相处的论断。尽管苏俄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理论，也并未真正地相信可与资本主义长久共处、“和平”会长久存在，但在事实上，却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国家共存的空间关系。这突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只能存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单一状态，探索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可以寻求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的新的交往模式。

列宁认为，若要使苏俄长久地生存下去，既要发展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又要主动地与资本主义发生经济上的联系。这两方面的关键结合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sup>②</sup>。苏俄可以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改善国家工业条件，充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利用经济手段同样可以实现革命目的。列宁明确指出，租让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继续，不过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不是在破坏而是在发展我们的生产力<sup>③</sup>。苏俄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获得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条件，现在苏俄需要通过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施加主要影响<sup>④</sup>。受此影响，1921年7月，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策略方针进行了调整，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直接进攻策略，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一次重大改变。

经过列宁重新调校过的革命理论是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理论的又一创新和发展，也是一次关键性的战略调整。苏俄摒弃单纯依赖外援的革命方略，转而通过内生性的发展机制追求革命目标，这一思想具有超阶段的理论指导意义，对苏俄时期

外交战略的演变提供了思想指引。归根结底，苏俄并未放弃其远大的革命理想，只是变换了一条实现途径。弱化革命手段，在外交中发挥经济手段的长处，并不意味着革命的退步，而是策略的矫正。

## （二）苏俄国际角色的再定位

苏俄在对外交往中的角色定位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其客观性体现在，世界整体局势、地缘战略环境和国家的战略实力制约了外交战略的实施，苏俄的角色定位应以上述要素为依据；其主观性在于，外交活动服务于国家利益，目的是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此过程中，外交主体对自身归属存在期许。另外，苏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有一套系统的价值观和相对明确的奋斗目标，既增添了苏俄国际角色定位的特殊性，也表现出苏俄国际角色的双重性特征。

列宁在1917年前提出俄国可能先于欧洲各国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并着手进行准备。他期望俄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担当起革命先锋的角色。

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对俄国革命形势的乐观看待，对于苏俄的革命角色延续了革命前的判断。1918年1月，列宁指出，苏俄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和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将承担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使命<sup>⑤</sup>。“布尔什维克期待随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将爆发世界范围的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会奋起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并且无视国家间的边界来建设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激发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中。”<sup>⑥</sup>对于苏俄另一个代表国家利益的对外角色，由于革命外交的火热推行而未得到凸显。

1919年下半年，随着欧洲革命形势和苏俄国内局势的恶化，苏俄的对外角色发生了悄然变化。12月，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向协约国提

<sup>①</sup> 参见俄罗斯现代历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4，目录1，第27—28、31页（请提供俄文原文），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第291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sup>③</sup> 同上，第43页。

<sup>④</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sup>⑤</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sup>⑥</sup> [美]彼得·帕雷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34页。

出媾和建议。苏俄不同以往的主动姿态是对革命外交角色的突破，他在寻求与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政府级别交往的过程中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再定位进行尝试。

随着苏波战争的结束，苏俄面临的革命形势发生了转折。列宁对形势做出的总体判断是，苏俄虽然没有获得国际胜利，但给自己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之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sup>①</sup>。这个形势促使苏俄的国际角色发生了双向化改变。在革命层面，通过经济手段稳固并强化革命政权的策略替代了对资本主义的直接进攻策略，苏维埃政权将以革命“引导者”角色，通过榜样的力量把其他国家与民族吸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sup>②</sup>。而对于不得不与之共存的资本主义国家，苏俄表示出对既有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接受，愿与其加强经贸联系，从而树立一个可以与各国保持正常经济联系的“和平共生者”形象。这个国际角色定位成为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贸关系和实现政治关系正常化的纽带。

从历史进程来看，苏俄在初期经历了外交角色一分为二的调整，从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转化为面向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力量的“引导者”以及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发展经济利益的“和平共生者”，开创了苏俄对外交往中的双重角色模式，成为苏俄外交战略的重要特征。不容忽视的是，双重化的国际角色定位也使苏俄外交活动面临两难抉择，例如，苏俄的外交部门除了要发展同外国政府的国家关系，时常还需执行对各国革命团体予以支持的任务。而支持各国民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将不能很好地发展同该国的国家关系，会给国家间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影响苏俄的国家利益<sup>③</sup>。

### （三）苏俄外交战略目标的调整

保罗·肯尼迪在《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中提出，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不论在何种层次、何种类型的战略中，战略目标都是关键性构成要素。对于外交战略目标来说，维护国家利益是其根本出发点。而战略性利益（strategy interests）<sup>④</sup>是从国家诸多利益中选取出的根本的、关键性利益，它直接影响战略目标包含的具体内容<sup>⑤</sup>，是战略重心之所在。

苏俄时期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在战略性利益的基础上确立的，并且随着战略性利益的调整而呈现出

阶段性的不同。

在利益界定方面，苏维埃俄国与以往的国家不同，他不仅代表着俄国的国家利益，还代表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作为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权，他还是世界革命利益的总机关。对这一情况认识不明或不合时宜地片面夸大，将直接导致在界定苏俄的战略性利益过程中产生混淆。

苏俄建立伊始，基于对欧洲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判断和对自身“革命先行者”的角色定位，苏俄的国家属性从属于世界革命属性，将“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战略性利益，而作为新生政权所应被重视的国家生存利益则被忽视。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俄罗斯民族自决权的利益。受此影响，国家间正常外交失去存在的理由，要让位于推进世界革命的行动<sup>⑥</sup>。

俄国成功开启了革命的序幕，接下来的战略性目标便是坚守革命阵地，等待欧洲革命的爆发。在面对协约国干涉军和国内反对派的联合侵袭中，苏俄始终坚持这一防御性战略目标，直至内外形势发生变化。苏俄领导人意识到，苏俄政权与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和平，“两个阵营”之间的任何和约都只不过是停战协定，而任何协定都只不过是新一轮冒险搏斗之前的“喘息”<sup>⑦</sup>。要维持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就不能仅依靠外部援助，还应建立保证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内生性机制，强化国力。

在对国际角色进行调整后，苏俄一方面针对资本主义阵营强化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针对各国的世界革命火种追求革命利益，这样就形成了在外交上确立并追求“国家利益”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23页。

② 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第33页。

③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④ 这种利益有时也被称为至关重要的利益（vital interests）或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表示的都是最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关键性的特征。参见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⑤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第70页。

⑥ 列宁、托洛茨基等苏维埃领导人认为，世界革命的很快到来将使外交政策的存在毫无意义；布尔什维克主张废除国家的意见将使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彻底失去存在价值。参见[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⑦ 《特别委员会关于苏维埃驻爱沙尼亚使团秘密工作条件的报告》，1920年9月2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页。

追求“革命利益”的双重互动局面。前者，采取既有的外交手法；后者，采取自建的组织形式。这种双重互动局面，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国际关系中，它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故将发展利益作为第一考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它将自身定义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故将革命利益作为第一考量。由于民族国家身份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本营的身份是同构的，因此，在苏俄的理论建构中，维护其民族国家利益也就是巩固并壮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似双重化的局面，实质并不矛盾。基于这种逻辑，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一方面以国家身份在中国交往吴佩孚，另一方面又寻找可合作的革命力量。但是，从现实情况考量，新兴的苏维埃国家毕竟力量薄弱，只有生存并发展起来，才有实力主导并支持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用契切林的话说，俄国的政策是一个笼罩在神秘中的谜，其钥匙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sup>①</sup>。鉴于此，苏俄将国家利益列为第一考量，暂时弱化革命利益，也是必然的。但是，从终极目标上说，国家利益是服务并服从于革命利益的。换言之，苏俄的国家利益，就是革命利益，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与形势下，其轻重缓急、长远性与暂时性结合的策略性不同而已。

新的外交战略目标的两翼分别是确保苏维埃俄国安全和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与苏维埃政权追求国家生存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求相一致。苏俄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经贸关系，既能壮大国家实力，也可以增强苏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通过榜样力量的示范，引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依然可以达到维护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目的。新的外交战略注重苏俄国家安全和国际环境的维护，同时负有推动世界革命的使命，是一个兼含革命扩张和常规外交的混合体<sup>②</sup>。

### 三、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局势的形成

总体而言，苏俄面对的外交对象主要有三类：第一，地缘关系紧密的周边邻国，主要包括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等，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或属于俄国势力范围，或实力较弱，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

地位；第二，以英、法、美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强国，他们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主导者，对苏俄奉行敌视政策，反对苏俄融入国际社会；第三，从第二类国家中提取出的“关键性”国家，主要有德国、英国、美国等，这三个国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角色关键，对苏俄外交的推行具有突出意义。随着苏俄外交战略的调整，战略布局对战略实施的影响逐步显现，苏俄针对不同类别外交对象施以不同外交手段，其所面临的战略态势逐步改观。

#### （一）“和平共处”打开苏俄外交新局面

国内战争后，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长期僵持、不分胜负的共存局面。列宁将这种局面称为“均势”。这种局面虽不稳定，却是苏俄可以借此改变生存环境的机遇。“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sup>③</sup>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与苏维埃政权的较量正在“转向经济战争”，这一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军事较量”<sup>④</sup>。苏俄决定打出和平共处的旗帜，以积极的外交姿态与资本主义列强周旋。

1920—1921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对一战后急需恢复国力的西方各国打击很大，各国迫切需求新的市场来摆脱危机。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苏俄在农业机器、工业设备、运输工具、建筑设备等方面有着很大的需求，这对欧美商业界具有极大吸引力。西方对苏俄的封锁在经济利益刺激下逐渐松动，英、美、德、意等国商界均有意与苏俄接触，推动本国政府与苏俄发展经贸关系。

苏俄因势利导，决定在列强最为关注的俄国外债问题上做出让步，打开局面。俄共（布）中央同意承认“沙皇政府1914年以前所借外债”，前提是各国需承认苏俄，停止对苏俄的侵犯，并向其投入贷款。承诺各国如与苏俄签订经济协定，投入资本帮助俄国恢复经济，苏俄政府将提供给外国资本家足够的利润。1921年10月28日，苏维埃政府

<sup>①</sup> Brian MacDonald,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 Toronto: Canadia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1984, p. 85.

<sup>②</sup> Charles E. Ziegler, *The History of Russia*, Santa Barbara, Calif.: Greenwood Press, 2009, p. 84.

<sup>③</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sup>④</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77页。

正式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表达了上述意愿，建议召开国际性会议集中讨论这一问题。苏俄此举，实质是借经济手段撬动政治问题，是在外债问题上的妥协和经济利益为筹码换取资本主义列强对苏维埃政权的承认。

接到照会的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一改对苏俄的抵制态度，经过戛纳会议联合协商，决定邀请苏俄参加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英法两国政府首脑将戛纳会议通过的六项决议作为承认苏俄的先决条件，力图迫使苏俄政府承担偿付历届政府外债、归还外国财产、放弃革命宣传、不对邻国发动进攻等责任。但决议第一项所表达的——“任何国家均不得将本国的所有制、国家经济生活和管理制度强加给别国”<sup>①</sup>意味着列强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事实，这对处于弱势的苏俄来说，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苏俄高度重视这个能够实践新的外交战略的多边平台，期望在热那亚会议上利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和平力量与其他反动、侵略力量间的矛盾，分化资产阶级各国，实现“和平主义目的和贸易目的”<sup>②</sup>。列宁将参与热那亚会议看作一个竞赛，他提出：“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去热那亚的。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要看我们外交家的艺术了。”<sup>③</sup>在列宁亲自领导下，苏俄组建了包含外交人员和财经专业人士的代表团，制定了严谨的会议纲领和行动计划，为苏俄首次亮相国际会议做足准备。

1922年4月10日，热那亚会议正式开始。苏俄代表团副团长契切林在发言中明确表达了苏俄愿“在互惠、平等和充分的、无条件的相互承认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的政府以及贸易界、工业界建立务实关系”<sup>④</sup>的意愿。苏俄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广泛宣传了旨在改善苏俄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和平纲领，介绍了苏俄的租让政策，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针对协约国要求苏俄偿还历届政府所有外债的苛刻要求，代表团主张战前债务可谈判解决，但对战争债务不予承认。同时，代表团要求协约国赔偿因武装干涉给苏俄造成的损失，计390亿卢布。协约国对此予以拒绝，双方在债务问题上陷入僵持，正式会议进行至5月19日，未取得实质性成果。随后召开的海牙会议仍然无果而终。苏俄借用两次会议的时机，在多边场合宣传了苏俄新的外交理念，为

开启新的外交局面打下基础。

## （二）利用租让制打开资本主义世界的缺口，实现“突围”

早在1918年5月，列宁在《苏维埃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经济发展纲要》中初步提出向西方国家实行租让制的想法。苏俄酝酿向美国等国出租部分矿山、森林和油田。俄没有技术条件开发这些资源，租让出去一方面可以使国家获取一定租金，工人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另一方面可以吸取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美国在1919年3月派布利特与苏俄接洽，同期，苏俄通过驻美代表马尔腾斯向美国政府表达了进行贸易的意愿，但1919年夏天国内各派反革命势力的进攻给苏维埃政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协约国站在反对派一边，提供武器和装备资助，美国顺势中断了苏俄的贸易请求。

苏俄继续向美国释放合作信号。在9月23日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中，不再号召美国无产者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是表达了愿与美国恢复贸易关系意愿，并表示，如果条件合理，苏俄愿意给予美国一定的承租权<sup>⑤</sup>。但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使这一尝试最终归于失败。战争使苏俄面临严重经济危险：财政紊乱、农民的严重破产、饥荒等。革命的步伐受到阻碍，各种问题的焦点重新集中到经济上来。

1920年后，鉴于苏俄与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均势”局面，列宁意识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sup>⑥</sup>这些原来被苏俄人鄙弃的外交传统形式和惯例似乎是观察甚至影响西方行为方式的最佳途径，也是苏俄获得急需的贷款和信任的最好办法<sup>⑦</sup>。6月，契切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必须在

①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现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②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④ 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8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⑥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第167页。

⑦ Gordon A. Craig,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7.

工农政府和资本主义政府之间建立长期的关系。”<sup>①</sup>苏俄可以恢复屡次战争而中止的国内经济建设，利用国外资本发展本国生产力，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实行租让制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考量，更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列宁指出，“租让的存在就是反对战争的经济根据和政治根据。如果那些可能同我们作战的国家接受租让，这就使他们受到约束，不能同我们作战”<sup>②</sup>。租让制的突破口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即三种根本性的对立。列宁分析道，第一种对立，也是同我们最有关系的对立，就是日本和美国的矛盾。另一个矛盾是美国和其余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协约国同德国之间的矛盾<sup>③</sup>。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关系，以此保障苏俄的生存环境，这是苏俄实行租让制的战略意图。

1920年11月23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实行租让制的法令，将租让制这一苏俄革命者的全新发明付诸实践。欧美各国虽在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约束下对苏俄仍抱持不承认的态度，但出于利益驱动，各国工商业资本家表现出了普遍关注，开始和苏俄进行贸易洽谈，就连英国政府也与苏俄代表开始了贸易谈判。1921年11月2日，美国资本家哈默承租阿拉帕耶夫石棉矿的租让合同成为苏俄与外国资本家正式签订的第一份租让合同。此后，瑞典、美国、英国、荷兰、挪威、法国、德国等国的企业送交了数百份租让申请，经过严格审核和紧张谈判，1921—1922年，苏俄与外国企业签订了14份租让条约，1922—1923年，签订了33份租让条约<sup>④</sup>。租让制实行后，苏俄从英国、美国、爱沙尼亚、芬兰、挪威、巴尔干等地输入粮食、燃料、机械、五金产品，主要向英国、拉脱维亚、挪威、德国等国输出木材、石油、皮革、铁屑、羽毛、亚麻及其他农产品<sup>⑤</sup>。租让制缓解了苏俄的经济困境，而且，租让条约的受益方多为国家工业的要害部门，对苏联经济具有长远影响。

租让制拉动了苏俄的对外贸易。据统计，到1925年，苏俄的对外经贸水平与内战结束初期相比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1925年进出口贸易额达1435亿卢布，同比增长高达140%<sup>⑥</sup>，苏俄彻底走出建立之初外贸低迷的局面。

概而言之，苏俄通过租让制打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缺口，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获取了原料和技术

的支持，提升了苏俄国力。苏俄与欧美日等国的实业界建立了紧密联系，使其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关系得以缓和，客观上改善了苏俄的政治环境<sup>⑦</sup>。

### （三）以苏德和解为契机改善大国关系，摆脱孤立

与苏俄密切相关的大国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资本主义强势国家，以英、法、美为代表，他们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主导者，对苏俄奉行敌视政策，反对苏俄融入国际社会；另一类是德国和日本，两国仅在战败国和战胜国这一身份上存在差异，但同样对战后秩序心存不满。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宿怨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缺陷成为苏俄推行大国外交的切入点。苏俄领导人采取“先发展经贸关系，后发展政治关系”的策略，利用各国矛盾，寻求重点突破。

英国占据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与英国建立正式的经贸关系，进而获得其正式承认将会对苏俄改善国际环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以便更正常地进行贸易。”<sup>⑧</sup>在双方共同利益的推动下，苏英贸易协定于1921年3月16日签订，该协定确立了双方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为经贸往来开辟了道路。关键点，它遏制了资本主义列强干涉苏俄的企图，直接影响了各国的立场，增强了他们同苏俄开展贸易合作的推动力<sup>⑨</sup>。同年，苏俄与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成功签署了贸易协定，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得到加强，为解决政治承认问题打下了基础。

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俄与德国代表团展开外交谈判，谈判的过程并不曲折，备受战后国际体系冷落的苏、德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存在共同利益。

① [苏]尼古拉·茹可夫斯基：《苏联早期外交家的故事》，第15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78页。

③ 同上，第63、69—70页。

④ 陈之骥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上册，第192页。

⑤ 樊仲云：《苏俄近况》，载《东方杂志》1925年第24期。

⑥ 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9）》，梅国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713页。

⑦ 美国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各国对苏俄的承认仅标志着接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在，有时是希望改善贸易关系，而非因为他们对苏俄的态度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王毅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页。

⑧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1卷，第428页。

⑨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二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42页。

双方最终于1922年4月16日签署《拉巴洛条约》，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对德国来说，与苏俄的和解可以帮助其恢复国力，摆脱外交孤立状态。对苏俄来说，获得德国的正式承认意味着对反苏统一战线的突破。除经贸关系外，苏德两国还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苏俄不仅合作生产了急需的军事装备，还获得了德国军官团的援助<sup>①</sup>。而从当时苏俄整体的外交局势看，苏德建交加快了欧洲各国普遍承认苏俄的步伐。

尽管俄国发生革命后，美国对苏维埃政权坚持不承认<sup>②</sup>，对待和谈问题缺乏必要的诚意，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战场形势和国内政治局势决定对苏态度<sup>③</sup>，但不能阻挡美国企业与苏维埃政权的合作。美国资本家哈默在与苏俄政府成功签订石棉矿的租让协议后，将30家美国公司合组为联合公司，专门开展对苏贸易，向苏俄输送了大批的机械、药品及其他产品，缓解了苏俄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品严重不足的紧张局面。苏俄通过与美国实业界建立的贸易联系成功吸引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对苏贸易关系。来自美国商界的压力迫使商务部长胡佛与国务卿密商派遣经济代表团到苏俄解决问题<sup>④</sup>。经济外交打破了协约国对苏的封锁，起到了缓和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作用。

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开始在新的外交平台上与欧美各国进行经贸往来。随着对外经贸关系的拓展，苏俄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在“承认苏联”等竞选口号下上台，决意改变英国的对苏政策。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英国提出承认苏联政府“是接受这一政府管辖的、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的合法政府”<sup>⑤</sup>，同时要求延续与沙皇俄国间的已签条约。苏联政府采取灵活的态度，在复照中确认了苏联政权的统治效力，建议协商解决旧条约的问题，以期尽快获得英国的政治承认。两国的建交谈判于1924年2月2日完成，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苏联的资本主义大国。

在英国引领下，意大利、挪威、希腊、奥地利、丹麦、法国等分别与苏联建交。1924年是苏联外交的丰收年，苏联的外交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 （四）多管齐下，改善外交布局

在努力改善与资本主义大国关系的同时，苏俄领导人并未放弃对东方国家革命运动的关注，具体负责外交工作的契切林更是极力推动支持东方国家

反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将“东方政策”<sup>⑥</sup>视为苏俄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对已取得阶段性革命胜利并具有统一政权的土耳其和阿富汗，苏俄通过放弃沙皇时代的特权和债权，给予其财政和物质援助的方式，发展了与凯末尔政府和阿曼努拉汗政权的革命伙伴关系。苏俄于1921年2月28日和3月16日，分别与阿富汗和土耳其签订友好条约，正式建交。在波斯，苏俄一方面与政府进行建交谈判，承诺放弃俄国在波斯的特权和势力存在；另一方面则支持库楚克汗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北部吉兰地区建立了政府。1920年5月26日，苏俄中央决定由伏尔加—里海区舰队司令拉斯科尔尼科夫负责对吉兰革命政府实施派遣教官、志愿人员和提供经费等形式的援助<sup>⑦</sup>，并陆续派出穆季瓦尼和奥尔忠尼启则到波斯，对吉兰政府进行革命指导和主持援助工作<sup>⑧</sup>。

在远东，苏俄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采取了革命外交和政府外交的双重手段。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苏俄政府外交代表越飞来华，与孙中山商谈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问题。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布，表明了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越飞回国后，加拉罕继任来华，与北京政府和奉系势力商谈对苏俄的承认事宜。鲍罗廷、布留赫尔在同期来华具体指导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行动。苏俄在中国采取政府外交和革命外交均取得了成效。1924年5月31日，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9月20日，与奉系政府签订《奉俄协定》。

① Charles E. Ziegler, *The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2009, p. 85.

② 1920年9月2日，美国国务卿本布里奇·柯尔比在给意大利驻华盛顿大使罗兰多·李奇的信中明确反对承认苏维埃俄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国家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而美国政府只能承认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柯尔比的主张成为历届美国政府不承认苏俄政府的依据。参见：[苏]B. A.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89—90页。

③ 参见沈莉华：《从对抗到承认：1917—1933年的俄美关系》，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2, pp. 825-835.

⑤ [苏]维戈兹基：《外交史》第3卷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6页。

⑥ 契切林在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对东方政策的表述为：为了反对协约国，如果不是直接提供武装力量援助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要提供武器和金钱的援助。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第409页。

⑦ 《托洛茨基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电报》，1920年5月26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第401页。

⑧ 《契切林致列斯京斯基的信》，1920年7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第413页。

至此，苏俄获得了中国南北势力的共同认可，扩大了在远东的影响。

此外，苏俄依托优势的地理区位条件，成功实施了具有独创意义的地缘外交。为缓解白卫武装、捷克军团、日美等国干涉军对苏俄东部安全局势的威胁，苏俄决定设立缓冲国。远东共和国于1920年4月6日成立，5月14日获得苏俄承认。他对外作为主权国家行使其各项政治职能，在发展战略和外交安排上，统一服从苏俄中央的领导，其主要使命“是完成二位一体的任务，即保障苏俄在外贝加尔与远东的和平、最无严重后果地消除外国武装干涉”<sup>①</sup>。俄共中央先后成立远东局、中央远东局，以保证俄共（布）中央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对远东共和国内外政策的领导<sup>②</sup>。

由于远东共和国以民主政府的面目示人，使国内外反对派丧失了继续武装干涉的理由。利用这一良机，远东共和国派出外交代表，与日本、美国、中国接触、谈判，为推动外国军队撤离、获得政治承认和发展对外经贸关系而广泛活动。1921年上半年，远东共和国不仅与美国温特商行签订了租让阿穆尔麦尔塔克河8个金矿的协议，还同美国奥盖梅尔·克辛格公司签订了贸易合同<sup>③</sup>。成为孤立的苏俄一扇对外的窗口。1922年10月，日本从西伯利亚撤军后，苏俄整体安全局势业已稳定，远东共和国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1月15日并入苏俄。远东共和国为苏俄的地缘外交增添了一个鲜活、成功的案例。

综上所述，多重外交手段的综合应用对有效改善苏俄的外交孤立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结论

苏维埃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首次成功实践而形成的兼具“国家和革命”双重属性的独特政权，具有区别传统的、高度理想化的革命特质，以推动苏俄冲破资本主义体系的限制为大目标，从而形成了1921年前苏俄“以外交推行革命、革命高于外交”<sup>④</sup>的外交布局。

苏俄外交大战略的形成与演变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列宁对苏俄外交总体思考的直接影响。具体体现为：通过发展苏俄国力保存革命根据地进而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所有的外交、手段等外

交各项要素都围绕这一大战略展开：在一战后国际政治局势、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形势以及苏俄国内政治态势的共同作用下，列宁放弃了单纯依赖欧洲革命援助苏俄革命的路线，探索利用两种社会制度国家所形成的“均势”局面，开辟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交往模式，协调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

起初，苏俄将自身定位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而后根据局势变化将国际角色重新确定为面向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力量的“引导者”以及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发展经济利益的“和平共生者”，逐步形成了苏俄在国际交往中的二元化角色模式。

在战略性利益的界定上，苏俄改变了过于重视革命利益的倾向，确立了追求“国家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双向化利益愿景。与之相应，苏俄的外交战略目标由1921年前的“保证俄国革命阵地的存在”转变为1921后的“确保国家安全，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关系”。

苏俄综合运用多重外交手段，结束战争状态，取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构筑了相对安全的周边环境，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承认，取得了显著的外交成果，为苏俄下一阶段的国内建设和革命推进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苏俄时期的外交一改最初拒绝一切传统外交形式和惯例的态度，开始有意识地回归传统，朝着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方向演化，探索利用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与惯例发展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革命理想主义”风格的外交布局逐步向“革命现实主义”风格过渡。以列宁为代表的苏俄领导人以超越寻常的眼界与智慧，构筑了苏俄外交的大战略，在大战略指导下，理顺了战略与策略、革命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带领苏俄突破国际格局的制约，赢得外交主动，维护了苏俄这一世界革命阵地的存在。这种大战略视野对其后的苏联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初祥：《远东共和国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②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一分册，第181页。

③ 初祥：《远东共和国史》，第277页。

④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的观点与此相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意是宣扬一场完全根除外交政策的世界革命。正是基于世界革命与处理国际关系互为悖论的原因，苏俄在建立初期以革命手段处理对外关系，一度甚至取消了国家的外交职能。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493页。

## The Diplomatic Layout and Evolution of Soviet U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nd Strategy

Liu Yu

**Abstract:** At its early stage, the diplomacy of Soviet Union featured strong revolutionary idealism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carry forward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due to the lack of desirable practice environment. After World War I,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pattern and world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urged Lenin to abandon former “entrepreneurial plan”, combine revolutionary theories with new practical experience, apply the general rule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 with bourgeois states, establish new strategic framework and adjust diplomacy layout practically. After 1921, the diplomacy of Soviet Union changed its initial tendency of refuting all traditional diplomacy forms and practices, started to turn to tradition consciously, and evolved towards tradi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role positioning of Soviet Union,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diplomatic strategy measures diminished the influences of ideology and struck a balance tactfully between revolutionary ideal and realistic state interest and diplomatic traditions. Thi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diplomatic status of Soviet Union and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us, diplomatic strategy targets of Soviet Union were able to be realized and strategic position improved gradually. The basic outline of diplomacy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Soviet Union took shape preliminarily in this process.

**Keywords:** Grand strategy; Soviet Union; diplomacy; traditional diplomacy; economic and trade contacts

## Развитие дипломат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под углом зрения больш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Лю Юй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лись явны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идеализм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спытывала трудности вследствие отсутствия подходящей среды для е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реализац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после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перемены, вызванные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заставили Ленина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плана и, соедини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ую теорию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искать общие принципы примен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общепринятые правила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азработать новы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рамки и, опираясь на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После 1921 года первым изменением в совет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стал отказ от всех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форм дипломатии и установившейся практики, затем начинается осознанный возврат к традициям и развитие уж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традиционализма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роль и полож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и другие факторы уменьшил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длежащим образом установив баланс между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и идеалами, актуаль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традицией, что сыграло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роль в продвиж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а также в улучшении условий дл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Цели совет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были достигнут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менялас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происходит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ольш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